

## 第六章 結論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導彈研發及擴散，一直是全球共同關切的議題。北韓領導人利用此議題，擁有核武及導彈自重，加上北韓在東北亞地緣政治的重要地位，利用美國與周邊國家厭戰、畏戰的心理及相互間利益與衝突交錯的矛盾現象，運用靈活詭變的談判技巧與戰爭邊緣（brinkmanship）的手法，挑戰強權，衝撞國際不擴散建制，作為突破外交與經濟困境的談判籌碼。北韓自 1993 年以來先後發動核武與導彈危機，而其引爆危機的時間點的選擇，更是具有戰略性的眼光，將核武及導彈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震驚國際社會。

本項研究旨在探討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扮演之角色，重點包括中共在北韓核武與導彈發展方面扮演之角色，及中共在兩次北韓核武危機中扮演之角色，並比較其異同。外交政策是國家整體施政的一環，必須依據國家整體發展需求來制定，而對內外情勢的評估是制定對外政策與開展外交活動最基本的背景依據。中共外交政策自然也是根據上述原則來制定。有關中共在北韓核武與導彈發展扮演角色方面，本文從中共與北韓關係及其核武政策演變、及學界與媒體披露中共協助北韓發展核武與導彈相關訊息，及對北韓核子武器與導彈發展具有何種意義，進行綜合研整，以推論中共扮演之角色。在中共在兩次核危機扮演之角色，本文從一般國家進行重大外交政策制定的思維邏輯與決策過程來分析，其中包括，危機發生時中共對當時國際形勢與朝鮮半島形勢評估及其總體外交政策、危機情勢判斷、政策考量與目標、中共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利益、立場與態度、策略與作為、發揮之作用等項，進行綜合分析，以推論中共扮演之角色，及其自危機中所獲之政經利益。

北韓雖早自 1956 年開始發展核能科技，並在前蘇聯提供設備、技術與訓練的協助下，奠定發展基礎。1980 年代，北韓核能技術能量有顯著的進展，包括建造 500 萬瓦反應爐、3,000 萬瓦的石墨反應爐及 2 億瓦反應爐的核能綜合工程等，顯露其發展核武的企圖，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北韓與中共 1959 年簽署核子合作協定，之後中共並未提供協助。1974 年 4 月金日成在赴訪北京期間，曾請求中共協助發展，並要求中共將北韓納入其核子保護傘下，中共僅同意提供北韓核子科學家及工程師相關訓練。1977 年 3 月北韓勞動黨書記姜成山與 27 名核子導彈專家赴訪中共，參訪新疆羅布泊核子試驗場及研究設備。根據中華民國清華大學教授鍾堅研究，北韓在俄籍顧問指導下，俄援核設施始終無法順利運作，最後才由中共接手，派出技術顧問駐點改建，北韓方於寧邊核特區建造核燃料元件生產廠、石墨原子爐及核廢燃料處理廠。1985 年 8 月 14 日寧邊原子爐達臨界運轉投產後，分離並純化鈾-239。迄 1993 年爆發第一次核武危機前，國際間推估北韓已分離出足夠製成 1 至 3 枚核彈的鈾。

北韓在 1987 年已將其 IRT-2000 型反應爐的濃縮鈾百分比，由 10% 提昇至 80%，但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停止供應北韓濃縮鈾燃料。北韓經由巴基斯坦核

子彈之父阿卜杜勒·卡迪爾汗( Abdul Qadeer Khan )秘密管道，在 1991 年至 1997 年間自巴基斯坦取得濃縮鈾技術與材料，包括製造濃縮鈾所需之高速離心機藍圖，使北韓生產鈾的主要核設施根據「框架協議」被凍結後，得以持續發展核武計畫。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核武技術係 1980 年代獲自中共，從利比亞提供美國的核彈設計圖等文件中，部分為中文書寫的技術資料，可證明擴散源頭為中共。在北韓核武發展計畫中，中共曾協助北韓提前突破鈾萃取技術瓶頸，使北韓在爆發第一次核武危機前，已分離出足夠製成 1 至 3 枚核彈的鈾元素，若加上第二次危機期間完成 8,000 支廢燃料棒再處理工作所獲鈾元素，外界預估北韓鈾元素總量至少可供製造 6 至 8 枚核子彈；中共雖未直接協助北韓發展濃縮鈾技術，然因中共對巴基斯坦輸出鈾濃縮技術，使北韓迂迴獲得中共離心機等設計圖紙與其他技術資料，外界甚至指稱北韓參與巴基斯坦核試爆，美國預估北韓最快在 2005 年或 2007 年可製造出以鈾為原料的核子彈。

北韓在 1984 年試射「飛毛腿 B 型」導彈，1987 年進入量產階段，並在 1987 至 89 年之間開始進行「飛毛腿 C 型」導彈及「蘆洞飛彈」發展計畫，1993 年射程「蘆洞」導彈試射成功，1998 年試射「大浦洞一型」，美國預估北韓隨時可能進行「大浦洞二型」導彈，此一發展速度，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是前所未見的現象，其中的關鍵因素就在於中共的技術援助。1960 年中期北韓曾向前蘇聯提出合作研製導彈的需求，但遭拒絕，因而轉向中共尋求生產導彈的援助。中共於 1970 年提供北韓蠶式反艦導彈、飛毛腿 B 型防空導彈 (SCUD-B) 與技術援助。1971 年 9 月，北韓與中共簽訂採購、發展與生產導彈及其他武器系統的協議；1976 年北韓派員參與中共使用液體燃料的東風 61 型 (DF-61) 導彈研發工作，此計畫後來雖於 1978 年取消，北韓工程師參與該型導彈之設計長達一年，吸取經驗與技術；1988 年北韓派遣 90 名軍事官員及武器專家赴中共銀川學習核子試驗及導彈飛行測試技術。此外美國指控中共企業為北韓的導彈計畫供應重要的零配件及原料。

以上的研究及報導若屬正確，則中共在北韓核武與導彈發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於中共的協助，北韓如今已是具相當核武能力國家，同時是第三世界少數擁有導彈研製能力與輸出國家，有能力以長程導彈裝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擊美國本土的第三世界國家，嚴重威脅東北亞區域安全，並在中東、南亞等地區造成軍備競賽。北韓以核武及導彈作為對抗美國威脅的「護身符」，也是其突破外交困境及獲取經濟援助的「工具」，90 年代以來不斷地演出發展核武或威脅使用核武的戲碼，在東北亞區域興風作浪。中共當年為拉攏北韓對抗前蘇聯與美國，協助北韓發展核武與導彈，冷戰後演變成中共國家利益的一項威脅。然中共卻能利用其在朝鮮半島的特殊地位與影響力，在兩次北韓核武危機中獲取政經利益，而且極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中共過去在朝鮮半島的重要事件上，如支持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積極參與並力促四方會談取得進展、積極促成並歡迎南北韓高峰會議等，均發揮其作用，對化解危機、維護區域穩定，做出一定的貢獻，中共一再表示，其不會在朝

鮮半島問題上扮演調停者。中共在兩次北韓核危機中，也未承認扮演任何角色。事實上，由於中共在解決北韓核危機上具有獨特的地位與影響力，中共在和平解決兩次北韓核危機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確保其戰略利益，同時也維護了朝鮮半島與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

在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中，中共主張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朝鮮半島非核化及和平解決危機。中共認為北韓核問題是朝鮮半島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未直接介入紛爭。中共多次出面呼籲美國、北韓及相關國家和平解決危機，強調美國與北韓應以「外交談判」與「對話」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在美國與北韓軍事嚴重對峙，危機陷入僵局時，仍極力主張更多的談判、更多的對話和更多的勸說才是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的唯一途徑；另中共分別利用與美國及北韓互訪時機，進行勸和及促談工作。中共雖未直接介入危機當中，亦無明顯證據可證實在美國與北韓之間進行穿梭協調或居間調解，但在美國與北韓經談判未能解決爭端時，中共出面協助當事方解決爭端，盡全力作為北韓與美國關係的緩衝與潤滑劑。在緊張的危機情勢中，對美國與北韓發揮勸和與促談作用，有助於雙方最終達成「框架協議」，使危機和平落幕。因此中共在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中扮演的角色，就其所發揮的作用而言，勉強可稱為斡旋者及調停者，雖然角色不明顯。

在第二次北韓核危機中，美國與北韓嚴重對峙時，中共適時提議並在北京舉辦三邊會談，讓美國與北韓首次有溝通對話機會，打開僵局，奠定和平解決危機的基礎。之後中共又密集派員穿梭各相關國家，進行了大量、艱巨、複雜的協調與斡旋工作，也向相關國家提供建言，在中共協調與斡旋下，又成功地在北京舉辦三回合的六邊會談，將危機導入和平解決的軌道，對於東北亞局勢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作用。中共已成為這場危機中的重要一員，雖然中共仍十分低調，避談所扮演的角色。自第二次核危機發生迄今，很顯然地，中共扮演三邊與六邊會談的東道主與會議主席的角色，在危機中更扮演斡旋者與調停者的角色。隨著未來危機的進程，中共也有可能扮演更多的角色，如安全保證者、經援提供者等。

在北韓核危機上，中共對朝鮮半島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歷史關係、與北韓長期的密切交往、對北韓提供大量的經援關係、又具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亞太大國地位，與美國及其他有關各國同時保持正常的關係，使得中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具有一種誰也無法否認的特殊地位，也使得中共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過程中一直具有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與朝鮮半島核危機相關的各國中，任何其他大國都不同時具備上述條件。兩次核危機中，美國與相關國家均籲請中共出面協助化解危機，中共巧妙地將相關週邊國家對中共的期望結合自身利益，謀取並擴大政經利益，不但達成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維繫北韓政權存續及改善與美國關係等主要目標，直接或間接獲取可觀的政經利益，有效提高其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同時也贏得國際社會的讚揚。

兩次北韓核危機也提供了中共不同發展契機。中共在第一次危機的表現，配

合其綜合國力的上升與龐大的市場吸引力等因素，加上冷戰後各國轉向發展經濟的風潮，一方面讓世界意識到中共在國際政經的發展潛力，美國與西方國家因此相繼取消對中共大部分的制裁，並由遏制政策轉向全面接觸政策，與中共發展各種政、經、軍合作交流關係，有利於中共重建國際形象；另一方面中共因此走出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陰影，逐漸以大國姿態與其他世界大國積極交往，建構不同面向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更加確立其亞太大國及世界多極格局中一極地位。以上兩方面產生加乘作用，有利於中共加速促進經濟發展及不斷提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在第二次核危機中，中共更是打破其外交慣例，在美國與北韓陷入僵局時，中共適時介入，在各方之間進行穿梭外交，為緩解這場危機進行了艱巨複雜的協調與斡旋工作，成功地在北京舉行三邊會談與三回合六邊會談，不但為和平解決危機奠定基礎，未來六邊會談有可能為東北亞地區實現長久和平與穩定提供了一個新的對話機制。危機雖尚未落幕，中共已經在改善與美國關係及其他政經利益方面獲得實質進展，其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也水漲船高。

21 世紀初，中共認為朝鮮半島與台海情勢仍為亞太主要熱點，而且逐漸將兩者作連動處理。對中共有利的，中共自然是樂觀其成，但是若會威脅到中共的安全，中共則強力反對。中共對美國的態度就是在此評估下，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政策。中共在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的歷史使命後，使中共對美國整體外交政策傾向「重合作，輕對抗」。雙方在國際反恐、經濟貿易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中共認為美國調整東亞駐軍，發展導彈防禦系統和外交佈局，主要為因應朝鮮半島與台海情勢變化，並加大對中共之威懾與圍堵。中共一方面與美國發展戰略關係，穩定區域情勢，另一方面則亟思突破美、日圍堵，強化其國防武力，並發展與東亞諸國多邊關係。因此，中共一方面繼續與美國在北韓核武問題及東北亞事務維持良好協調互動關係，避免直接對抗，同時加強鞏固與北韓傳統情誼，維繫北韓政權存續，避免面對後金正日時代不確定的情勢，提高其區域影響力，展現和平發展形象，增加對美鬥爭籌碼，同時遏制台獨勢力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有關戰略和外交是和平解決北韓核危機的一個關鍵，而且大有助於中國成為未來東亞國際政治極少數主導者之一，甚至很顯著地促進中（共）美之間在東亞的政治影響力對比最終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質變。中國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最關鍵的角色，決定性參與塑造東亞的未來格局。中共正趁勢將其影響擴展到其他領域，而且結合經濟實力來營造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外交環境，利用市場和經貿關係的巨大輻射力使國際社會日益向中國靠攏，一個新的國際外交與經濟核心正在中國形成，為中共穩定週邊，立足亞太，走向世界，開創新局。

歷史上，台灣命運的重大轉折，兩次均與朝鮮半島有關。一為 1895 年中日馬關條約，一為 1950 年韓戰。目前，朝鮮半島情勢又已發展到一個歷史的新轉捩點，會不會再次牽動到台灣的命運，不僅應為台灣、北韓所關注，也同樣為北京及華府所關注。在這場外交新局中，台灣應認真思考，在中共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日益提昇之際，如何避免被邊緣化，並為國家長遠發展找到自己的定位。

《紐約時報》在 2002 年 10 月報導北韓秘密發展濃縮鈾核武計畫，曾引述華

府高層官員的話說，「中共在北韓的核武發展計畫中扮演一定角色」，中共外交部立即鄭重否認。美國政府或相關智庫並未進一步公佈相關資料。有關中共協助北韓發展核武方面，由於事涉機敏，資料來源及相關論述均非常缺乏，目前僅發現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at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提供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組織資料中，發現部分中共協助北韓發展核武與導彈資料，及鍾堅教授在〈北韓與核武，世局變亂局〉專文，指稱中共協助北韓突破鈾元素提煉技術；另媒體報導北韓經由巴基斯坦核子彈之父阿卜杜勒·卡迪爾汗 (Abdul Qadeer Khan) 秘密管道，取得濃縮鈾技術與材料，均提供了本項研究非常寶貴的材料，對本項研究之完成助益甚多，惟以上資料僅提供部分解答，期待學界繼續搜尋更多的資料加以佐證及補充，使之更完善。

